

周鴻俊 著

周鴻俊 文藝評論選



中華詩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鸿俊文艺评论集/周鸿俊著. —中华诗词出版社, 2006. 3

ISBN 988-98615-2-6

I. 周... II. 周...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华诗词版本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372 号

书 名: 周鸿俊文艺评论集

作 者: 周鸿俊

责任编辑: 张登峰

出 版: 中华诗词出版社

电子信箱: zhsccebs @ sohu. com

发 行: 中华诗词出版社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 1168

开 本: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88-98615-2-6/I · 229

定 价: 29.00 元

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文学艺术家——周鸿俊

(代序)

李振邦

在新时期文学豫军的队伍里,有一员在中国文坛,尤其在河南文坛上征战了半个世纪,并且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的老将,他就是周鸿俊先生。他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教育家,又是影视文学评论家,小说、戏剧作家和诗人,还是造诣深厚的书法家和出色的文学活动家。

一、生平与道路

周鸿俊今年恰好年届七旬,从事文学艺术活动50年。他的生平与文学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时期。

1. 文学活动的准备期(1935—1956年)

周鸿俊于1935年3月15日出生在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七朝古都开封城内的一个贫寒家庭里。他自幼丧母,从6岁起跟随启蒙老师梁先生读私塾。梁先生是清末秀才,既懂得中国古代文学,又写得一手好字,工颜楷,经常给人书写匾额、对联。周鸿俊在梁先生的指导下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字训》、《千字

文》等启蒙识字课本,为以后成为文学家打下了文化基础。同时,他又在梁先生的严格教导下,用中楷把这几本书都写完了,又为以后从事书法艺术练好了“童子功”。

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周鸿俊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49年,开封解放不久,他考入新中国的开封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一方面阅读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同时,他又师从谢瑞阶、叶桐轩等著名书画名家,坚持练习书法。1952年暑期,他考入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中原最高学府——河南大学中文系。在这里,他一方面受到钱天起、李嘉言、任访秋、万曼等名家大师的教诲和熏染,坚持在文学领域里继续深造;另一方面,他又师从于安澜、高文、李白凤等诸位专家、教授,坚持学习书法理论及书法艺术。其中,国学大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于安澜先生对他的教诲更多。总之,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为他以后从事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创作,以及从事书法创作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丰收期(1956—1966年)

1956年暑期,周鸿俊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因其品学兼优,被留校在中文系任教。从此,他在高等学校文科的教学岗位上工作了8年,直到1964年奉调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工作。在从事高等教育的8年间,周鸿俊主要担任本科生的“文章习作”专业课的教学。他是一位又红又专的优秀青年教师。凡是他教过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刻印象:他不仅学识渊博,造诣深厚,讲课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深得学生赞许,而且师德高尚,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对全体学生一视同仁,深受学生爱戴。凡是他教过的学生都乐意向他请教,与他交往。他总是像慈祥的兄长那样,待人诚恳,循循善诱。他可谓德高望重,师表楷模,是学生的良师益友。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周鸿俊又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文艺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了深入地理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文艺观点,他不仅广泛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的论著和中外著名文艺理论家的论著,并且把重点放到攻读毛泽东文艺思想上。他曾经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经典文献连读多遍,通篇背诵,并且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好几遍。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中国文艺界的‘宪法’,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文艺经典,应当牢记在心。”于是,他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武器,对文艺理论、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对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这突出地表现在1962年,他参加《奔流》杂志组织的关于“含蓄”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理论文章《含蓄不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这篇论文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阐明了“含蓄”不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而是“风格、表现方法与审美情趣的特点之一”。(见《奔流》1962年5月号)

同时,周鸿俊又主动走出书斋,积极参与当时社会上文艺界的活动。他与著名的河南籍作家李準是好朋友,他对李準的小说和电影创作非常关心,并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河南乃至全国最早研究李準的评论家之一。早在1961年李準的电影剧本《喜旺嫂子》(拍成电影后更名为《李双双》)一发表,他就在《奔流》1961年11月号上发表评论文章《一曲新人的颂歌——评〈喜旺嫂子〉》。1964年,当国庆15周年来临之际,李準根据自己的小说《两匹瘦马》改编的电影剧本《龙马精神》,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功,作为向国庆15周年的献礼影片。周鸿俊为此片专门撰写了1.3万字的长篇评论,发表在《电影文学》杂志1966年第2-3期上,在当时电影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由此而成为河南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电影评论家。

1964年冬和1965年春,周鸿俊与作家李準等河南省文艺界一批干部被派往信阳地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

清运动”)。他与李準朝夕相处几个月,在工作之余进行了多次文学畅谈。李準向他倾吐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创作经验和体会。他在每次谈话后都及时地进行了“追记”,作为研究李準及其创作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研究李準、评论李準这个课题上大有作为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场长达10年的政治运动中,他的研究计划被迫中断了。

3. 小说、剧本创作的丰收期(1966-1982年)

由于周鸿俊在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工作,并且是宣传部门,再加上他发表过一些评论李準等的文艺批评文章,因此,当“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狂风暴雨突然袭来时,他是始料不及,也是躲避不及的。于是,他在这场政治风浪中几经颠簸。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的几年里,他曾先后被调离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安排在开封地区文化局并被派往当时河南省最为艰苦的兰考县工作。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政治风浪虽然把他抛向偏僻艰苦的兰考县,但却出人意料地给他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深入基层、深入生活的好机会。他因此参加了长篇传记小说《焦裕禄传歌》创作组,得以利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到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和兰考县广大干部和群众之中,去调查、了解、搜集、感受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积累了大量的生动材料和感人细节,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激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1973-1975年他与创作组其他同志一起开始了长达60万字的长篇小说《焦裕禄传歌》的创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长篇小说至今尚未能发表和出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周鸿俊与全国亿万人民一样,感到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又焕发了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的青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他的思想大解放,在工作之余,又投入了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研究。他与友人石

发亮合作撰写的长达十几万字的研究专著《论〈阿Q正传〉》在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函授通讯》杂志1979年第5期-1981年第1期上连载发表。这部专著在当时的鲁迅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1年,周鸿俊被任命为开封地区文化局局长。为了繁荣文艺事业,他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又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智,与人合作把扬剧《包龙图误断狄龙案》改编成了豫剧《包公误》。由于这个剧本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很短时间内,被全国几十个剧团争相演出,并于1981年拍摄成电影戏曲片,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行上映,获得普遍好评。1982年,他还与人合作改编了豫剧传统剧目《穆桂英下山》,改名为《穆杨会》。该剧与《包公误》一样,紧跟时代潮流,推陈出新,赋予时代精神,令广大观众耳目一新。他还于1982年与人联合创作了豫剧舞台剧《青蛇传》,成为传统剧目《白蛇传》的续编,富有新颖的创意。1982年12月他还根据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在长篇小说《焦裕禄传歌》的基础上,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县委书记》,由珠江电影制片厂特约,并已经通过了审查,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拍摄。

总之,周鸿俊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小说、剧本等文学创作的丰收,使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剧作家。

4. 文艺活动和书法活动的丰收期(1983-2005年)

1983年,周鸿俊调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正厅级)。他带领全厂职工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为河南省电影制片厂组织了多部电影剧本的创作,并拍摄了多部艺术片和纪录片,赢得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例如,该厂与香港合拍了故事片《阮氏三雄》,还拍摄了《十五的月亮》、《武当仙袍》等。尤其是该厂拍摄的豫剧戏曲艺术片《倒霉大叔的婚事》荣获国家广电部优秀影片奖。这与他高深的艺术才智和精干的领导、组织才能是分不开的。这些影片都

是经他精心加工、把关和审定的。

1990年,周鸿俊调任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他又在更加广阔的文艺天地里为新时期河南文艺事业的繁荣发挥着自已卓越、独到的才能。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在厅党组领导下参与组织领导了河南的戏曲创作和演出,连连推出多部优秀剧本,在全国范围演出,连连获奖,充分展示了河南作为戏曲大省独有的优势。例如,他主持录制了越调诸葛亮系列艺术片,将越调艺术大师申凤梅主演的七部舞台戏,全部录制成像带,在中央电视台和许多省台播出。该系列片获得河南省文化艺术工程奖。他亲自担任电影剧本编剧的曲剧《阎家滩》,由南阳市曲剧团演出,并拍摄成为戏曲艺术片,受到全国广大观众的好评,荣获1998年文化部“华表奖”。

不仅如此,周鸿俊还曾于1993年率领河南省豫剧友好演出团赴祖国的宝岛台湾访问交流演出,与台湾的河南籍乡亲,与台湾的文艺界朋友,以及广大的戏曲观众结下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这次访问获得极大成功,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大力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中原文化,有力推动了两岸人民的思想文化交流,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还曾于1994年和1995年先后率领河南省杂技艺术团和少林武僧团赴日本和加拿大交流访问,增进了中日、中加人民的友谊,获得极大成功。总之,这一时期,周鸿俊成为活跃在海峡两岸及中日、中加之间的文艺活动家。

这一时期,周鸿俊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书法艺术领域。他从6岁进私塾启蒙就练习书法,一直坚持了大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成为独具一格的业余书法家,在河南省书法界有较大的影响。他属于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文人书法家。他把文学艺术的理论、智慧和灵气,都创造性地贯注、融会到书法作品中,达到了较高的境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曾经多次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览,并且出版多部个人书法作品专集,受到专家和社会的好评。例如,1994年6月,他在河南省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

《周鸿俊书法作品展》，并于1995年出版了《周鸿俊书法作品集》（海燕出版社）。第二次规模较大的个人书法作品展，是在1998年5月，这次展出的书法作品只有一幅100米长的书法长卷，题目是《河南群芳谱》。这件百米长卷是他用最擅长的行楷体写成。字体既刚劲浑厚，又俊秀灵动；既显示了深厚的书法功底，又闪烁着作为一位文人书法家的书卷灵气。这次展览更为成功，又一次受到专家和广大参观者的高度评价。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李长春为之作序，省长马忠臣、著名作家李準、河南书法名家陈天然为其题词。著名文学评论家孙荪等专门发表题为《以雅通俗》的评论文章，高度赞扬他的卓越成就。2002年河南农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书法作品集。

1997年周鸿俊正式退休，但他退而不休，老当益壮，又收获了一批文艺成果。首先，他在20多年前发表的鲁迅研究专著《论〈阿Q正传〉》的基础上，重新构思，撰写出近20万字的文学评论专著《阿Q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他又致力于中国新旧体诗词的研究和创作，出版了诗集《周鸿俊诗词选》，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怀让为之作序，高度评价他的诗歌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他还出版了书法艺术专集《周鸿俊实用书法作品选》等。

综观周鸿俊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艺术生涯，他有30余年一直是地市级或省级文艺部门的领导干部，同时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评论家、教育家，又是小说家、戏剧家、诗人，还是文学活动家和书法艺术家。他把大半生的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像他这样既是省级文艺部门领导干部，又是有多方面建树的文学艺术家的人是极为少见的，极为难得的。他的主要业绩载入《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和《中国文艺家传集》等书中。从2005年起，周鸿俊陆续出版《周鸿俊文集》，共7卷，近百万字，收入了他的主要文学研究论著及文学、书法创作作品。这部文集基本上反映了周鸿俊半个

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成就的全貌。

周鸿俊除了担任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和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正厅级)外,还兼任了多种文艺界的职务:河南省文史馆馆员、河南省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省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河南省影视评论学会会长、少林书画院业务院长、河南诗词学会会长、河南省老年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河南省华侨书画院院长、《东方艺术》杂志编委会主任、河南大学及郑州大学兼职教授等。

二、主要文学成就

周鸿俊活跃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的 50 多年里,在文学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现列举其几个主要方面予以评介。

1. 文学理论研究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20 多岁的周鸿俊就是河南文坛上比较活跃的青年文学评论者之一。他在《奔流》1962 年 5 月号上发表了关于“含蓄”问题的理论探讨文章,题目是《含蓄不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他认为,有人提出“含蓄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的主张,把艺术作品具有典型性、概括性和普遍性与“含蓄”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他列举了“含蓄”一词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的来历,归纳出“含蓄”一词的本意有三:一是包容,二是词有尽而意无穷,三是以简约手法传达丰富的内容。把它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很明显都是形容风格或表现方法上的特点。这就首先从概念上弄清了“含蓄”的含义。接着,他从正面明确指出,从创作的角度讲,“含蓄”是作家、作品的风格特点和表现方法的特点之一;作家的风格,作品的表现,可以含蓄,也可以不含蓄。从欣赏的角度讲,“含蓄”又是品评作品的审美趣味之一。有人喜欢含蓄的作品,有人不喜欢含蓄的作品,这都无可非议。即是同一个人欣赏作品时也不是单打一的。他列举出高尔基的散文诗

《海燕》和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就义诗》为例,前者含蓄无穷,耐人寻味;后者爽朗明快、直言不讳、淋漓尽致,但二者均为名篇佳作,深受读者喜爱。再者,他引用鲁迅的论述,指出“含蓄”的作品与“览之了然”的作品各有其价值,不能简单地厚此薄彼。很明显,鲁迅是把“含蓄”看作风格和表现方法特点的。作家或作品含蓄与否,是由时代、环境、作家的思想修养、艺术情趣、题材、体裁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并非像有人主张的那样是“作品内容决定”的。最后,他再次明确强调:“总之,‘含蓄’只是风格、表现方法与审美趣味的特点之一,如若把它当成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或说什么没有含蓄的作品就不值得回味,要大家搞创作时都一律‘含蓄’,是不合乎创作实情的,也不符合百花齐放的要求,自然也就行不通。”

这篇论文在理论上观点明确、概念清晰;在方法上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说服力强;在态度上既严肃认真、原则性强,又心平气和,以理服人,谦虚谨慎;在文风上既稳重练达,又生动活泼。总之,这篇论文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在当时的文学理论界和文学创作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这篇论文显示了周鸿俊作为一位青年文学理论家的扎实的功底、良好的素质和杰出的才华。

2. 文学评论

周鸿俊在文学评论方面取得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对作家李準作品的研究和鲁迅《阿Q正传》的研究两个领域。

①对李準作品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李準的电影文学剧本《喜旺嫂子》刚刚发表在《奔流》1961年7、8、9号上,时隔1个月,周鸿俊就在《奔流》1961年11月号上发表了长达6000字的评论文章《一曲新人的颂歌——评〈喜旺嫂子〉》。这篇评论文章充分肯定并明确指出《喜旺嫂子》有以下几方面优点:1.在整体上,它是一曲对农村新人的

颂歌,它用热情的笔描绘出这些新人(以李双双为代表)的内心美,同时,也很有分寸地勾画出一些在新人影响下,由旧变新的人(以孙喜旺为代表)。2. 它用“栽桩”的手法,一开头就提出三条线索,表明孙喜旺要治服妻子李双双,迅速地展开矛盾入了戏,在矛盾的漩涡里考验人物。剧本就这样以李双双与孙喜旺的家庭矛盾为主,演绎开故事情节。这样安排正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剧本主题的要求。从普通人物身上发现不平凡的东西,抓住主要矛盾突现人物的主要特征,歌颂了新人新事,这已经是李準创作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这个剧本也是这样。3. 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家庭矛盾具有社会性,解决这个矛盾就不会那么简单。剧本中李、孙的矛盾冲突有七个回合。这七个回合是孙为代表的落后人物失败的记录,也是李为代表的先进人物胜利的记录;是喜旺由降服者变为被降服者的过程,也是双双由家庭妇女、普通社员成长为坚强的生产队长的过程。从李双双身上,我们看到了新生的幼芽如何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作者歌颂了新人,也歌颂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4. 它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也很成功。其第一号人物李双双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社员与干部,也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妻子和母亲。作者多方面刻画了她的性格和形象。作者运用明暗虚实的结合,让人物立体化,给人以实感,既真实可信又可亲可敬。喜旺这个人物写得也很成功,全剧里他作为李双双的对立面贯穿始终,最后才有了转变,对于他的缺点和改正缺点的过程都写得很有分寸,令人信服。5. 它的戏剧冲突是严肃的、尖锐的。但是作品的主题和时代的特征规定了全剧的乐观基调,剧本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喜剧的声波。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喜剧特征的典型细节来刻画人物,体现主题。6. 作者还善于运用和发挥电影艺术特有的表现方法,矛盾突出,对话简洁,入戏迅速,动作性强,尤其是动作性强是一个重要特点。当然,这篇评论在充分肯定剧本成就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剧本的几点不足之处。

总之,这篇评论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艺术的规律出发,较好地抓住剧本的优点与不足,恰如其分地进行评论,对作者的创作,对读者的欣赏,都是大有益处的。同时,这篇评论写得很有条理,层次清晰,语言准确、生动、流畅,表现了周鸿俊评论文章的一贯风格。

发表在《电影文学》1966年第2、3期合刊上的长篇评论《韩芒种形象的塑造及其社会意义——电影〈龙马精神〉观后》,则是周鸿俊研究李準作品的更重要的收获,并且显示出他作为杰出的电影评论家的更为成熟和老到。这篇评论共分为5个部分。作者在文章开头首先肯定电影《龙马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电影《李双双》的姊妹篇。其主人公韩芒种的形象,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和强烈的感染力,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广大农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其次,作者充分发挥他对李準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第一手背景资料熟悉和了解的优势,介绍了李準先写成小说《两匹瘦马》,又改编成电影剧本《龙马精神》的动机、背景和经过。再次,作者将李準于1963年11月在小说《两匹瘦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龙马精神》,与原小说的内容加以对比,原小说的内容比较单纯,主要表现主人公韩芒种是个勤巧劳动的能手,他把瘦马喂胖,把穷队变富的自力更生精神。而电影剧本中则体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增加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第四,作者介绍了从电影剧本初稿到电影拍成,作品的内容又有重大修改。如增加了韩芒种兴修水利的情节,以加强其自力更生的精神;如删去了陈金生和水枝谈恋爱的情节,使影片更加集中突出韩芒种。另外又加进了韩芒种支援世界革命的思想。第五,作者又评析了电影中对加强韩芒种形象所表现的几个精彩细节:梁斗从怕受苦到存心刁难韩芒种;韩芒种从“接受”任务到主动“争取”任务;韩芒种喂马从拌草料到磨豆浆;马被

牵走后,韩芒种的“三回头”等。这些精彩细节都加强了韩芒种的人物形象,也是李準作品常用的一大特色。第六,作者强调指出了韩芒种形象的深刻社会意义。他是体现了党的“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伟大号召的成功艺术形象。他既有丰富远大的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既坚信未来无限美好,又正视眼前的重重困难。他的形象又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等。总之,韩芒种的形象,是李準继李双双之后,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人物艺术画廊的又一个贡献。

今天,当我们审视周鸿俊这篇评论文章的时候,当然也应当一分为二: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周鸿俊这篇评论是站在当时——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意识的高度,从宏观上来评价《龙马精神》这部电影及其主人公韩芒种的形象的,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广度;同时,又在小说与电影两种文本的精细对比中从微观上评论了电影的成就。这在当时,是研究和评论李準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在全国影坛、文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这篇评论文章中反映了周鸿俊、李準以及全党全国当时受到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看待一切问题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毋须回避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②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研究

周鸿俊对鲁迅、尤其是对鲁迅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的研究前后将近30年。他在原开封师范学院《函授通讯》1979年第5期至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论〈阿Q正传〉》之后,又经过25年来的深入研究,同时广泛吸取了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于2005年重新撰写了长达近20万字的研究专著《阿Q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仅是周鸿俊在文学评论领域的一部厚重力作,也是新世纪以来我国鲁迅研究领域有份量有特色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这部论著的特色可以归纳为几个字:新、深、细、美。

“新”:角度新、见解新。首先,这部理论专著的书名就很新颖——《阿Q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翻开这部论著的目录,读者会更觉新颖:“第一章,荣与辱——《阿Q正传》的主旨和意义”,是对《阿Q正传》这部中篇小说的成就意义和地位的总论;第二章“车与辙——《阿Q正传》的人物与故事”,是对这部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描写成就的评析;第三章“奇与真——《阿Q正传》的奇特性与真实性”,是对这部小说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评析;第四章“喜与悲——《阿Q正传》的艺术风格”,是对这部小说的艺术风格的评析;第五章“其他——《阿Q正传》研究涉及的其他问题”,是这部论著的结论,提出了几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其次,更为引入注目的是,这部论著的见解新。例如:作者认为,仅从文学的角度论述《阿Q正传》,不可能把它深邃的内涵说透,因为这部小说,尤其是阿Q的形象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已经突破了文学的范畴,进入了心理学范畴的社会心理领域,形成了研究《阿Q正传》的新课题。这正好反证出阿Q的形象是概括性很强的典型,是一部触动了全人类社会心理的伟大著作,反证出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毛泽东语)。又如,作者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有消极意义的坏处,而且也有积极意义的好处。它的最主要的“可取之处”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化解精神苦恼,减轻思想压力。作者的这个见解,是大胆的、新颖的,没有先例的。这不仅是作者非凡智慧的表现,而且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总之,本书中的新颖见解很多,令人读之耳目一新。

“深”:挖掘深。鲁迅及其小说作品,尤其是《阿Q正传》,自1921年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后的80多年里,研究者不计其数,发表的研究论著浩如烟海,已经形成了专门学问“鲁学”。要想研究出新意,要想挖掘出深义,谈何容易。难能可贵的是,周鸿俊的这部论著就有新的突破。作者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和先

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阿Q正传》的研究就挖掘出了深层的意义。例如,在本书第一章“荣与辱——《阿Q正传》的主旨和意义”中,作者首先大量列述了茅盾、叶圣陶、巴金及毛泽东等的评价,论述了《阿Q正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接着,作者又大量列述了法国的罗曼·罗兰和前苏联的瓦西里耶夫等外国人的评价,明确指出,鲁迅及《阿Q正传》在国外的影响是中国作家及中国小说作品的第一位,鲁迅及《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荣!又如作者深刻地指出《阿Q正传》描绘出一幅辛亥革命惨遭失败的宏伟画卷,形成了一面“历史的镜子”;而它塑造的阿Q的形象则是一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成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永放光辉的艺术典型。再如,作者深刻地指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身上。因此,《阿Q正传》对人类自我优化的贡献,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时代的界限,也超越了文学艺术的界限。

“细”:剖析细。周鸿俊的文艺评论文章本来就有剖析细致的特点,而这部论著中这一特点则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在第二章“车与辙——阿Q的人物与故事”中,作者从整体、言行、细节、环境等方面多角度、全方法、立体地论述、评析了作品塑造阿Q这个主要人物的手法和成就,一共列出18个专题,其评析的细致、透彻、条分缕析、淋漓尽致,是以往研究鲁迅作品的论著所少见的。其实这18个专题,合起来是个整体,分开看就是18篇各自独立的专题研究论文。又如在第二章第二个专题“未讲故事,先出人物——别开生面的《序》”中,从4个方面分层次进行评析:一是为阿Q立什么传,二是考证阿Q的姓氏,三是考证阿Q的名字,四是考证阿Q的籍贯等。再如第二章第三个专题中,作者将阿Q的性格分为8种元素14个侧面进行评析。再如这部论著中第三章“奇与真——《阿Q正传》的奇特性与真实性”和第四章“喜与悲——《阿Q正传》的艺术风格”中,也都很有条理地从各个角度和侧面

进行了精细的剖析。

“美”:语言美。由于周鸿俊既是有造诣的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又是小说、戏剧作家和诗人,因而,他的文学评论文章有一个一贯的特点,就是语言优美。这一部论著的语言风格更加表现得集中和突出,那就是庄与谐的有机统一。他的语言在征引专家、名人的言论时,在阐述理论问题时,严肃、庄重,逻辑性极强,很有思辨性和说服力;而在评析作品的具体问题时,又常常喜欢运用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具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这个特点在这部论著的各个章节都能体现出来。因此,这部论著虽然长达近20万字,挖掘得深刻、剖析得精细,但读起来并无艰涩、乏味、沉闷之感,反而使人觉得生动、亲切、轻松、愉快。

3. 文学创作

周鸿俊不仅是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而且也是文学实践家,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他本人最满意、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他与几个友人根据扬剧《包龙图误断狄龙案》改编的大型豫剧舞台剧本《包公误》。

《包公误》反映的是北宋中期仁宗年间,身为龙图阁大学士(相当于副宰相)兼开封府尹的包拯,审理忠臣名将狄龙被诬告犯罪的故事。由于包拯此时已经年迈体衰,没有精力做深入细致的明察暗访,凭着自己多年断案的经验,而被假象蒙蔽迷惑,误判狄龙有罪,险些处以死刑。然而包拯毕竟是个清廉的官吏,他在弄清案情真相后,勇于承认错误,重新审理狄龙案,并且主动向狄龙赔礼道歉。周鸿俊改编这一剧目最大的特色和成就,在于他能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义:一是作为一名干部,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之风,正确处理现实问题,否则就会铸成大错,遗患无穷;二是作为一名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知错必改,有错必究,不论哪一级干部造成的冤假错案,必须坚决纠正,这样才能取信于民。这一